

晏彦早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艰难的路



序

彦卓君把他所著《艰难的路》书稿寄给我看，并嘱我作序。阅完书稿，掩卷沉思，竟久久不能提笔。

其实我和彦卓相识很迟，只是在一九九四年南开中学九十周年校庆之际，才有了第一次也是难以忘怀的聚会。也许因为都是性情中人，有着极其相似的家庭背景，同出一源的基础教育和熔于一炉的代际阅历罢，不需太多的接触，已经使我感觉和他恍若故知了。是的，我相信应该相识很久很久了。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无疑是一部自叙体纪实性的文学作品。彦卓以他外科医生的冷静和诗人般的热情在这儿歌吟着人生，其中不乏期望、痛楚、磨难、执着、眷恋、奋斗与成功。只要看下去，你就会被他牵引着一同去“再梦昨日”。可贵的是，书中每一段文字都是从作者心中流淌出来的，汨汨荡荡，无挂无碍，不遮不拦，无所不自然又无处不见真情。所以它必定会引起广大读者，特别是一代知识分子心灵的共鸣。

二、三十年来，特别是七十年代后期以来，许多大陆的知识分子由于多种机缘而移居香港，他们大都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程。然而，尽管有着生活上、语言上、心理上、乃至殖民地歧视政策的种种障碍，凭借着在大陆受过的良好教育和专业技能，得力于几十年风风雨雨、浮浮沉沉、困顿生活及因此而能与底层人民相接近所受到的锤炼，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意志坚强、刻苦勤劳、韧性十足，不断开辟生活的道路并在香港社

会中站住了脚。他们同香港卓越的工商业者、卓越的公务人员一道，构成了香港社会的精英，促进了香港的繁荣与发展，功莫大焉。彦卓是他们中的一员。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文集其实不仅仅是个人的自叙。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夕出版这本书是很有意义的，它提示我们，对所有使香港成为今日香港的人们的奋斗与贡献不应忘却。香港明天的繁荣，仍然有赖于他们不懈的奋斗、精彩的创造和连续不断的成功。

张昭若

一九九六年七月于天津

前 言

早就想为持香港医务委员会执照的医生们写点什么，因为他们是我的好朋友，又是同路人。他们大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辛酸经历。表面上看来他们在香港考到了医生执照，在这里行医名利都有，是大陆人来香港中的幸运儿、宠儿，但他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才换得来今天，每个人的成功都是来之不易的。

他们是热爱祖国的一群，是中国人。由于某种原因，七、八十年代他们痛苦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告别了父母和亲人来到香港，在这样一个殖民地社会挣扎求存。过去，他们也受过磨难，到了香港，面对的是更加残酷的现实：歧视、冷落、欺侮！就因为他们来自大陆，就因为他们“穷”。他们什么样的工作都干过，为了养活儿女，做苦力、当工人、做街边小贩，甚至甘冒被检控的风险，明着或暗着做无牌诊所的医生。他们求助无门，是被遗忘了的一群。但他们不是弱者，靠自己的努力，以真的本事，考取了香港医务委员会执照医生。在从大陆来香港的近千名医护人员中，他们属幸运者，至今，已有九百多名这样的幸运者在香港各个角落为市民服务。

但是仍有许多大陆来的医生被拒之门外，他们之中有的仍在做苦力，是这个社会上劳苦大众中的一分子。少数运气好的则在经商或做老板。为了求生存，不少人仍躲在无牌诊所里行医，终日在恐慌中渡日，他们没有地位也没有尊严，为了五

斗米而委屈求生，是可怜的一群。

考到医生牌照和没有考到，简直有天壤之别，但又有谁能想到他们都有说不出的苦呢！

作者谨以此书献给香港医务委员会执照医生，记录和保存他们的辛酸史和奋斗史，“忘记过去，就是背叛！”。

并以此书鼓励还没有考到医生执照的同行们，希望他们早日成功。

谨以此书迎接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一个多世纪的殖民地统治，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将随着历史的巨变被抛弃。崭新的未来让中国人自己来开创吧！

娄彦卓

1996 年于香港

婁彥卓著

艱難的路

金庸題



金庸先生与作者合影

艱
難
的
路

姜彥章著
張浚生題





张浚生先生与作者合影



作者简介

晏彦卓是香港的外科医生，早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1953年考入湖南湘雅医学院学中医，在校期间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从事外科医生工作，文革下放劳动，在农村热情为农民治病，深受患者的爱戴。1979年后移居香港，1983年通过香港医务委员会执照考试，其后在香港执业西医，自行开办诊所。

本书是晏彦卓的处女作，是他根据个人经历，利用繁忙的行医的间隙时间写成的。全书包括《艰难的路》、《格格》、《诊所姑娘》、《下放》及《情系南开》等五篇文章。题材新颖，感情浓重，文笔朴实。书中一、四、五篇描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奋力拼搏、自强不息的成长过程与艰辛创业经历；也表达了一个历经多年沧桑移居香港的游子对祖国的眷恋之情。读之引人入胜，感人肺腑。作者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时，百感交集，怀着极大欢欣，奋力完成书稿。谨以此书迎接香港的回归。

目 录

序	1
前 言	1
艰难的路	1
格 格	71
诊所姑娘	111
下 放	149
情系南开	179
后 记	207

艰难的路

一、南下列车上

1978年12月的一天，阴霾的天空，不时飘着蒙蒙细雨。立作拎着一个小手提包，在省城的火车站告别父母和兄姐，登上开往广州的列车，走了。

立作在这个中型省城里，度过了青少年的美好时光。他在这里上了中学、念了大学，直到留在市里的一所医院当了医生。是这块土地哺育了他，使他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他对这块土地充满了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

列车飞快地在原野上、山谷中奔驰着，窗外葱绿的田野、澄碧的江河、高耸的山岭——在车窗前掠过。车轮有节奏的滚动声，加上不时长啸的汽笛声，似乎要向人们诉说甚么！往事在不知不觉中浮现在立作的脑海里，由模糊而清晰，渐渐地使他陷入对往事的沉思和追忆中。

自从1958年医学院毕业后，立作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文革中又下放到偏远的山区农村，直到1974年落实政策时才调回省城。逝去的时光，有喜也有忧，但更多的是说不尽的辛酸与痛苦。这些毕竟都已过去，如今展现在他眼前的，将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真如雾里看花，扑朔迷离，难以猜测。立作想着想着，不觉又掏出深藏在内衣口袋里的那张“港澳通行证”，反反复复地端详着。这是前几天省公安厅发给他去香港

的通行证，他将凭着这张卡片去另一个陌生的世界闯天下，是喜是忧，前途未卜。这也许是他下了生平唯一的一笔赌注，是输是赢，难以估测。他越想越觉心中空虚，竟感到害怕起来。

这时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喊他的名字，他脑海中的翻腾一下子打住。回头望去，才弄清是身后的旅客在忙乱中不知把什么丢失，正向同伴叫喊着什么，在朦胧中竟听成了是“立作”。转身又想再继续追思下去，可又怎么也对不上号了。这时肚子咕咕的响了两下，坐了大半天的车，肚子也空了。立作拿出母亲为自己上路而特意赶做的馒头和茶蛋慢慢吃起来，馒头和茶蛋在这时吃起来又香又甜，吃得津津有味的立作忽然又想起了母亲。她已过早衰老了，头发已花白了，一辈子为儿女操碎了心，而今儿子却要远离母亲，奔走他乡，心里怎么能舍得？怎么能不难过！这一次出门，可不是出差，过得十天半月就能回来。这一次出门是要去个遥远的地方，去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一座罗湖界桥，隔着两个不同的世界。此去是福是祸，吉凶难卜，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回到故乡，吃一口母亲亲手给儿子做的饭！想着想着，立作嗓中不觉哽咽起来，手中的馒头，再也无法下咽了。

立作今年四十四岁了。人到中年才重新生活，才去开创未来，摆在他面前的这条路，该是多么地艰难啊！圣人说“三十而立”，如今立作早已过了三十，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有所作为呢！

回想青少年时代，十一岁时他在天津市一所全国知名的中学读书。在学校的教导下，明白了一些善恶是非。在1946年中国解放战争正在推进时，年纪小小的他就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当了个小“交通员”。在学校里爬围墙，钻阴沟，将一叠叠的革命传单带出学校。在戏院里，当灯光刚一熄灭时，将传单撒

的满场飞舞；在街上，手里拿着一串冰糖葫芦，趁人不注意，拿出一张传单，粘上冰糖葫芦的糖浆，把传单贴到墙上转身就跑。在“反内战”、“反饥饿”游行中，他也总走在队伍的前列。其后不久，他跟随父母南下来到这个中型省城，进了一所颇有名气的中学继续他的学业。1949年8月迎了解放，新中国的成立为他和他的家人增添了生命的活力，他在祖国灿烂的阳光下茁壮成长。他在1949年底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省城里最早的一批团员。随后，他考入在全国也有些名气的省城医学院，担任着班长和团干部。他以满腔的热情奋发学习，为的是学成之后能以优异的成绩报效祖国。他是学校的优等生，还是运动场上的健儿，也是话剧团里的演员。在同学中，大家愿意和他接近交朋友，他是信得过的朋友和同志。就是这样一个有抱负的热血青年，怎么也想不到却在1957年那场风暴中遭到劫难，这一跤摔得可好狠好惨啊！但他还是坚信历史是公正的，历史会给予他正确的评价，所以他从不灰心，也不气馁，跌倒了再爬起来，昂起头做一个真正的人。可是他在磨难中也学乖了，他把精力全部用于技术上学术上，他认定知识就是财富，自己掌握的知识就是自己的财富，学到手的技术既能用于为人服务，而又不会被别人夺去。后来他虽没有任何进修的机会，但是他的医疗技术却屡屡被人们认可，他自己也重新被人们尊重和信赖，他感到这已经够幸运的了。

文革中，他属于应该和必须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改造的一族。没想到，下放农村后他却有了英雄用武之地。在偏远穷困缺医少药的山区，由于立作这批医务人员的到来，使得医疗卫生条件大为改善。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在立作的手术刀下，解救了许多病人的痛苦，用他的智慧

和技术挽救了许多垂危的生命，得到了上至县委下至贫下中农们的信任。这可能是他的幸运，也可能是上天对他的恩赐，从最简陋的手术室，经他剖腹治疗的众多病人，竟还没有发生过一起医疗事故。文革后期落实政策，立作被调回省城，重新分配到一所新建的医院，他一如既往，又满腔热忱地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去。

在列车上，立作想来想去，一整夜都未曾好好睡一会儿。等到太阳升起，将一缕红光射进车窗时，才知道已经是第二天了。早上七时左右，列车抵达广州，立作随着人群走出车站。虽然此时正是冬季，但广州的天气仍象春天一样的温暖。立作在离开省城时，还穿了一件旧棉袄，此时已觉太热，只好把它脱下，搭在臂上。车站广场很宽阔，在车上挤了一路，此时顿感视野开阔。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觉得这里的空气特别新鲜，又贪婪地吸了几口，脑子似乎清醒了许多。站了一会儿，就拎起手提包，来到车站售票处购买当天去深圳的火车票。那时去深圳的人还不很多，买票的队伍不长，拿出通行证，很容易就买到了车票。

立作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南方最大的城市，因为人地生疏，买上车票后，既无心去观光市容，也不敢跨出车站广场，只是一直呆在候车室里等车，眼睛不时地盯着手腕上戴着的那块手表，这块“上海”牌手表是他结婚那年和妻子石玲一起到当地最大的一家钟表店买的，一人买了一块，到现在还走得很准。眼看着指针一分一秒地转着，不由得又想起了妻子石玲。

石玲和立作是医学院的同班同学，两年前她就带着两个孩子去了香港。石玲的父母是香港人，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所以在国内对外开放的早期，也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的

不久，石玲就申请去香港探亲，几经周折后终于获得批准，就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香港了。那时候，大女儿刚好高中毕业，天天都有人动员她上山下乡，几乎每天都有人登门重复着讲一些大道理。小儿子刚上初中，还算平安无事，不过正值文革，读的书也很有限。

到了香港以后，石玲马上为孩子找学校，可是花了许多时间，跑了好多学校，那些学校都不收这样的学生，首先是不会英文，无法跟班；再则不懂广东话，语言上无法沟通。虽然这样，但是石玲毫不灰心，一方面她在家为孩子补习英文，让孩子多看电视，从电视中学听广东话，又在家里订下一条规矩：家里的日常对话要全用广东话。小孩子们的记性好，学得快，没过多久就能用广东话应付日常事情了；另一方面她又天天在外面求爷爷告奶奶般地一间间学校去跑，哀求他们能收留她那两个可怜的孩子。皇天见怜，女儿被三育中学录取插班，儿子被香岛中学收留就读，但两个孩子都被降了一级，从低一个年级读起。

孩子上学的问题解决了，石玲却被留在家中服侍因脑中风而瘫痪了已有十年的老母亲和年迈的父亲。照顾两位老人的重担，原本是由她的弟弟和弟媳承担着的，但是弟弟为了养家糊口，却不得不抛下这对年老而又有病的双亲，石玲的来港，也就顺理成章地接下了副重担。

石玲的母亲不仅瘫痪在床，完全失去了生活的自理能力，而且脑子也糊涂了。刚吃过饭就又嚷着：“摆桌子”。若不依着她，就会大哭大闹个不休。有时又嚷着：“要屙尿”，可是当你把她扶到厕所，刚刚坐到马桶上时，又说没有尿了，整天吵闹个不停。就这样，一天不知折腾多少次，真叫人烦透了，但毕竟是

自己的母亲，再怎么烦也要忍受下去，石玲就这样为了一家老小而煎熬着。

此外，她还是在惦记着能找到个医生职业。这几年来自大陆的医生也不少，可哪怕是大陆名牌医学院毕业的，其资格也不被香港当局承认，他们都成了可怜的一族。不仅医生的自尊受到损伤，还得四处奔走寻求工作，挣钱养家糊口。石玲在医学院学习时，读书勤奋，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她来香港已有两年了，至今却不但没能再从事医生工作，而且也还没有一份自己的收入，带着两个孩子寄人篱下，立作此去岂不是又添了一张吃饭的嘴。

想到日后全家人的生活，真是不寒而慄？但多年的坎坎坷坷，立作养成了一种以乐观向上、甚至有几分诙谐的态度来处理各式各样的困难。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候再说吧。

这时候车室里的广播喇叭一遍遍地提示着去深圳的旅客开始剪票进站，立作如梦初醒，于是又拎起手提包，随着人群踏上了去深圳的列车。

广州到深圳只需三个多小时。列车象一条卧龙般向前飞驰。立作此时的心，也如同飞旋的车轮一样在剧烈地跳动着。不管还有什么样的大难题在等着他，但他很快就要同妻儿见面了，全家就要团聚了，这毕竟是他两年多来一直焦虑期盼着的一件事，想到这里他的嘴角不免露出一丝微笑。象过电影一样，立作忍不住又把妻子的往事回忆一番。

他的妻子石玲是1953年跟随一大批热爱祖国的青年回国求学读书的。那时是派了一列专车把她们接到省城的，当时火车站又小又破，正好那天又下雨，车站周围一片泥泞。立作当时是医学院新生接待处的学生代表，手里拿着当地特有的